

## 太平天國意識形態政策試析

王慶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文主要研究太平天國對孔孟儒學和古人古書的政策、態度及其影響、後果問題。很多學者的論著都指出，太平天國是最反孔孟的；反孔是它革命性的表現之一，甚至說是五四運動的前奏。這樣的看法包含兩層意思：第一是指出他們「反孔」的事實；第二是對這種「反孔」的作用加以評價。我認為這兩方面都有待深入研究。

說太平天國反孔，這似乎不錯。曾國藩《討粵匪檄》指責太平天國「竊外夷之緒，崇天主教」，「士不能讀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於九原」。曾國藩的檄文是公之於衆的，不可能憑空捏造。這的確是太平天國反孔的證據。本世紀有關太平天國的史料大量發現，五十年代初編輯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一種《太平天國》八冊，涉及太平天國反孔的記載不少，其中一篇過去從未刊印的舊抄本《金陵癸甲新樂府》是記天京（南京）見聞的詩五十首，有一首《禁妖書》這樣描寫：「爾本不識孔與孟，孔孟於爾亦何病？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這是一幅禁書焚書的狂暴景象。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些詩的寫作時間。曾國藩的檄文發布於甲寅年正月，即1854年2月，《金陵癸甲新樂府》作者馬壽齡住在天京是癸丑（1853）春至甲寅（1854）夏這一年多的時間。我們可以說，在這些詩所涉及的時間裏，太平天國對孔孟採取了詩中所描述的那種激烈政策；但不能據此就以爲太平天國對孔孟的政策一貫如此。根據我的研究，太平天國成員對孔孟的態度前後不一，而且領導層內部的意見也有分歧。

## 一

太平天國對孔孟態度的變化可以分爲三個階段。1853年太平天國建都南京以前是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從洪秀全開始信奉上帝、丟掉孔子牌位算起，足有十年時間。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應考不售，讀了梁發的《勸世良言》，把書的內容和六年前病幻中的所見比附結合起來，便自以爲獲得了真理，從此信奉上帝，排斥異神，反對偶像崇拜。他和自己的早期信徒將

書塾和家裏的偶像如門神、灶君等和孔子牌位都撤去。撤掉孔子牌位，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要有非常的勇氣。但這種舉動的出發點，只是反對偶像崇拜，並不是要打倒孔子。我們不可以把這件事同十年以後的禁書焚書聯繫起來、等同起來，以為洪秀全在那時就開始了反孔鬥爭。洪秀全撤去孔子牌位後，接著的幾年是傳教、醞釀造反、起義、進軍江南，期間對孔孟的態度主要是：不承認孔子作為大成至聖先師的教主地位——這是他們的上帝教信仰所決定的；但並未全部否定孔孟在思想文化上的價值。這從1853年以前寫定出版的太平天國著作中可以看到。

洪秀全在金田起義前寫了幾十篇作品，流傳下來今天可以見到的，有寫於1844年的《百正歌》，寫於1845年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和大約寫於1847-1848年間的《原道覺世訓》。這些著作在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都出版了。另一本很重要的《天條書》，大概出於洪秀全手筆，也在同年出版。這些書部分和本文討論的問題有關，而且都有這樣的一些特點：

各篇都提到孔孟，但不稱為孔子、孟子，而是直稱其名孔丘、孟軻。

在內容上，有些稱引孔孟儒學的倫理道德原則。如《百正歌》，廣泛徵引歷史典故，要求君臣、父子、夫婦、男女悉由「正道」行事，反對「不正」的言行，列舉堯、舜、禹、稷、周文、孔丘等古聖先賢為典範。又如《原道救世歌》，以禹、伯夷、叔齊、周文、孔丘、顏回等為例，宣傳「非禮四勿」、「富貴浮雲」之類的行為準則，徵引《禮記》、《詩經》、《孝經》等儒家典籍為說。

有的如《原道醒世訓》，大段引述《禮記·禮運篇》，推崇儒家的社會理想。

有些利用儒家典籍來論證太平天國的宗教觀點，如《原道覺世訓》引述《詩》、《書》、《中庸》、《孟子》等書，《天條書》引述《詩》、《易》、《大學》、《孟子》以及三代、商湯、文、武的事蹟，以證明上帝的權能，指出世人當拜上帝。

金田起義之後，楊秀清等在進軍途中發布了幾篇著名的檄文，1852年編為《頒行詔書》一冊出版。其中《奉天誅妖檄》說：「各省……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希望他們「各各起義」<sup>1</sup>。

1852年太平天國進軍湖南，有一篇專記太平軍在湖南的情況說，他們「自孔聖不加毀滅外，其餘諸神概目為妖」<sup>2</sup>。

太平天國本身的文獻和他們的行動表明，在這一階段太平天國雖然並不尊崇孔孟，還沒有完全否定孔孟。

## 二

1853年3月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後不久，意識形態政策有了明顯的改變。改變的地方主要是：否定孔孟、焚禁古書，尊崇《新舊約聖經》，實行出版統制。太平天國實行這些政策，在文獻

1 以上各篇均見《太平天國》，第一冊。

2 佚名《粵匪犯湖南紀略》，見《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一冊，頁67。

史料上有十分明確的證據。

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的當年，出版了經洪秀全批准的論文集《詔書蓋璽頒行論》，其中一篇由掌管一切文案的官員黃再興寫的論文很明確地宣布：「當今真道書者三，無他，《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按即《舊約》、《新約》）、《真天命詔書》也。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sup>3</sup>

黃再興的宣布和上文引述的關於「禁妖書」的描寫十分合拍。但黃再興宣布的焚禁對象不只是孔孟儒學，還包括了諸子百家。從太平天國這時對刊印書籍的修改程度來分析，他們所否定的，範圍比以前更為廣泛。

太平天國出版的書籍往往有多次修訂本。1853年他們在發動焚禁運動的同時，對前此出版的幾種重要書籍都加以修改。上文提到的《天條書》、《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篇中稱引、推崇孔孟經籍的所有段落和語句悉數刪去，《百正歌》全篇刪除；此外，還刪去了原先提到的一切古人的姓名和事蹟。

在刪去的古人中，堯、舜、周文、孔丘、顏回等不是儒家宗師，就是儒家道統中的代表人物；取消他們，可以說是否定儒學；但另一些古人，如管寧、狄仁傑、胡迪、海瑞，他們並非儒學的代表人物，卻也在被刪之列，這就很值得注意了。洪秀全原先引述他們，是稱道他們的某種行為或品性，如楊震不欺暗室、管寧自甘淡泊、狄仁傑等禁毀淫祠；現在一律刪去，並不是洪秀全改變了對這些行為、品性的評價。這從《百正歌》一篇全被刪除可以看得更清楚。《百正歌》一篇着重譴責男女關係中的不正當行為，引述正、反面歷史人物二十餘人。這篇著作之所以被刪，決不是洪秀全改變了對這些歷史人物行為的評價——對男女關係上的「邪」、「正」之分，洪秀全不但一直堅持，而且變本加厲，連祖母和小孫子也不准在一起——而是因為他排斥歷史人物。《百正歌》一篇只五百字而引述人物多逾二十餘人，不能像其他作品那樣可以刪去人物而保留說理部分，只好全篇刪除。

由此可以看出，太平天國在1853年實行的政策，所排斥的不只是儒家的經籍、儒家和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包括了各類歷史人物。概括地說，是一種否定一切古人古書的政策。

一方面拒絕一切古人古書，另一方面則積極出版《新舊約聖經》。修改前的洪秀全著作，大量引述中國儒家的經典著作《詩》、《書》、《易》、《論》、《孟》等，偶然也引用《舊約》、《新約》（稱之為「番國聖經」），但數量較少。在實行排斥一切古人古書政策的前夕，太平天國開始出版《舊約》、《新約》，稱為《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意謂上帝、基督留下的聖誡。最早出版的是《舊約·創世傳》的前半部。1853年4月，英使文翰（S.G. Bonham）訪問天京，太平天國贈書十二冊，最新一種即《創世傳》1-28章。當時，太平天國印書封面都是紅色的，獨至於《創世傳》用黃色，以示尊崇<sup>4</sup>。其後，法國、美國公使相繼往訪，英國官員又再訪，都分別得到贈書。

3 《太平天國》，第一冊，頁313。

4 曹墅居譯、簡又文校《英國政府藍皮書中的太平天國史料》，見《太平天國》，第七冊，頁915。

根據他們和隨訪人員的報導，截至英國的利文·鮑令(Lewin Bowring)等一行於1854年6月訪問天京時止，太平天國出版《舊約》至少已有《創世傳》、《出埃及記》、《利未書》、《戶口冊紀》、《申命記》、《約書亞書》等六種，新約至少有《馬太福音》傳一種<sup>5</sup>。

太平天國在禁絕中國古書、印行《新舊約聖經》的同時，又確立「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制度，規定一切出版物必須蓋有「旨准」印。太平天國稱他們自己編寫出版的書為「詔書」，宣布只有《新舊約》和《真天命詔書》(即太平天國編寫的書)才准閱讀。

既然一切古書都在禁止之列，太平天國自己編印的書籍又刪除了一切古人古書的痕迹，這樣就在文字方面隔斷了人民和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接觸。

上述的政策實行未久就遭楊秀清反對。1853年以前，楊秀清對孔孟的態度可以說是和洪秀全一致的。《鄂城紀事詩》曾經記載太平天國在1852年初佔據武昌時楊秀清曾衣冠拜謁孔廟<sup>6</sup>。這件事是否有誤解，尚可存疑。即使確實無誤，但當時的政策是獨尊上帝而又不盡廢孔孟，楊秀清和洪秀全態度不一也只是大同中的小異。但到建都天京實行焚書禁書並刪改已出版的書籍時，矛盾漸見明顯。建都天京後不久，楊秀清以天父降凡的方式說：「『天命謂之性，率性謂之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話，未便一概全廢。』<sup>7</sup>這兩句話見於《中庸》、《論語》；第一句，洪秀全在自己的著作《原道覺世訓》中曾加引用，但在修改本中已經刪去。楊秀清這次天父下凡，可能就是針對洪秀全的做法提出意見。當洪秀全將自己一些重要著作中的儒家典訓和述及一切古人古書刪除淨盡的時候，楊秀清的幾篇檄文彙編《頒行詔書》也出版了修改本，修改了初版中批評三合會的一段，但對原有的文天祥、謝枋得、史可法、瞿式耜等古人的姓名事蹟，則一概保留。1853年還出版了一本以楊秀清名義編寫的新書《太平救世歌》，反覆論述君臣親子之道，其中談及兄弟之道時仍引用《詩經》，有「詩有棠棣，其詠斯篇」之句。這是與洪秀全的做法大異其趣的。最後，到甲寅四年正月(1854年2月)，楊秀清又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十分明確地否定了排斥孔孟等一切古人古書的政策。

太平天國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楊秀清假天父下凡，對隨侍女官傅善祥說了許多話，令其轉奏洪秀全。天父指示的內容主要是：

對儒家經典作了肯定評價，說：「前曾貶一切古書為妖書。但《四書》、《十三經》其中闡發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齊家治國孝親忠君之道亦復不少。」

5 Rev. M.S. Culbertson,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Insurgents at Nanking", "A Report by W.H. Medhurst and Lewin Bowring". In P. Clarke et al. (eds.),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1982, pp. 145, 165, 168.

6 江夏無錐子《鄂城紀事詩》，見《太平天國資料》，頁39。

7 《賊情彙纂》，卷十二，《雜載》，見《太平天國》，第三冊，頁327。

對歷代史書作了肯定評價,說:「至若歷代史鑑,褒善貶惡,發潛闡幽,啓孝子忠臣之志,誅亂臣賊子之心。勸懲分明,大有關於人心世道。」

對古代英雄豪傑作了肯定評價,說:「自朕造成天地以後,所遣降忠良俊傑,皆能頂起綱常,不純是妖。所以名載簡編,不與草木同腐,豈可將書毀棄,使之湮沒不彰?」

天父明確反對焚書禁書:「千古流傳之書不可毀棄」,「真心忠正的臣僚傳述總要留下」。但對古書可以刪略:「凡有合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綺靡怪誕者去之。」<sup>8</sup>

天父這次指示的直接結果是大規模焚書局面的結束。同時,在天京設立了「刪書衙」,專司刪改《四書》、《五經》事,並宣布這些書刪改出版後准許人民閱讀。

太平天國開始刪書的時間,可能早於這一次天父下凡<sup>9</sup>。但緊接着這次天父下凡,洪秀全在甲寅四年二月下詔設局刪書,並在律書中宣布「凡一切妖書……爾等靜候刪改鐫刻頒行後始准讀習」<sup>10</sup>,卻不能不認爲是這次天父下凡的結果。

在緩和了對古人古書的打擊以後四個月,洪秀全推行出版《新舊約聖經》的做法也受到挫折。太平天國甲寅四年六月初一日,楊秀清又假天父下凡指示:

爾等將番邦存下的《舊遺詔書》、《新遺詔書》頒發,其《舊遺》、《新遺詔書》多有記訛。……此書不用出先。<sup>11</sup>

這是又一個爆炸性的指示。我們不知道洪秀全的具體反應如何,但這一指示無疑執行了。自此至 1856 年楊秀清被殺的兩三年內,我們沒有發現太平天國繼續出版《聖經》的跡象。

#### 四

洪、楊之間的矛盾是常有的。以前最重要的一次是建都問題。洪秀全主張從武昌進軍中原,取河南建都;而楊秀清主張順流而下取南京建都,最後楊以天父下凡的方式了結此事<sup>12</sup>。建都問題、對待孔孟等一切古人古書和《新舊約聖經》的態度問題,是洪、楊間幾個重要的政策矛盾。由於太平天國的政治 — 宗教體制,洪秀全不得不接受天父即楊秀清的決定,但

8 見筆者編注的《天父天兄聖旨》,頁 102-103。1984 年筆者在英國發現塵埋百餘年的太平天國印書《天兄聖旨》兩卷、《天父聖旨》殘存一卷,得以瞭解楊秀清有這樣明確的態度。由於這一確定的事實,我們才可能把前後的一些片斷記載聯繫起來研究。

9 太平天國刪改《四書》、《五經》,有學者認爲始於 1853 年建都天京後不久。其依據是《賊情彙纂》紀錄一則未著年月日的天王關於刪改《詩韻》即《詩經》的詔旨以及一名曾參加太平軍而於 1853 年 8 月脫離天京的人的報導。如果這種看法成立,那末刪書之事就可以說是跟焚書禁書同時發生的。但這一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和證明。

10 《賊情彙纂》,卷二,《曾釗揚》;卷八,《僞律》。見《太平天國》,第三冊,頁 57、232。

11 《天父天兄聖旨》,頁 110。

12 參見拙著《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93-216。

他自己的看法似乎並不因而放棄——特別是在對待古人古書的問題上。楊秀清對孔孟和古人古書作了肯定評價後，焚書禁書的政策緩和下來，但洪秀全本人排斥古人古書的態度並未改變。這導致了此後太平天國內部的某些紊亂和不統一。如在太平天國出版物上，在天父肯定古人古書後，以楊秀清名義撰寫的著作進一步地引用古人古書。最突出的是楊秀清的親信部屬根據他的意圖寫了一本《天情道理書》，書中包括了以楊秀清本人名義寫的詩五十首。此書稱引《詩》、《書》、《孟子》六次，讚美皋陶、禹、伊、呂、管樂、司馬遷、班固、關羽、張飛、趙雲等古人三十餘次。但另一方面，洪秀全的幾篇《原道》和《天條書》在此後的重刻重印本中仍然刪除了曾經引用過的古人古書。最為明顯的是太平天國戊午八年（1858）出版的一本《武略》，這是太平天國為考試武士子編的一部兵書，是清初編印的《武經三書》的刪改本，係「真聖主欽定」，即洪秀全親自審改的；而洪秀全的審改，恰恰是着重刪除《武經》三種（《孫子》、《吳子》、《司馬法》）中稱引古聖先賢的段落。如《孫子·用間篇》刪去「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一段，《吳子》刪去「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一段和齊桓、晉文、秦穆、楚莊等的歷史故事，《司馬法》刪去夏、商、周諸君主用兵、待民、賞罰等方面的歷史經驗等<sup>13</sup>。這都表明洪秀全堅持排斥古人的態度。

天父肯定《四書》、《十三經》後雖然成立了刪書衙，宣布了這批書刪改後准讀，但刪書工作却遲遲無成。洪秀全曾親自刪改《詩經》的一部分，要負責刪書者按照他的樣本，保留「真話、正話」，刪除「鬼話、怪話、妖話、邪話」；他刪改的原則較天父所指示的「留正道忠孝，刪綺靡怪誕」稍覺籠統。在南京居住過的文人曾報導太平天國刪書的情況，甚至說見到了刪改後的《四書》、《五經》。如張汝南記稱：太平天國「始以《四書》、《五經》為妖書，後經刪改後准閱。惟《周易》不用，他書涉鬼神喪祭者削去」，又說《詩》、《孟》中「上帝」俱加「皇」字，《論語》中「夫子」改「孔某」<sup>14</sup>。有學者根據這些資料認定太平天國出版了經刪改的《四書》、《五經》，其實不然。因為直到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1861）還宣布說：「真聖主御筆改正《四書》、《五經》各項，待鐫頒後再行誦讀。」<sup>15</sup>可見那時候經刪改的《四書》、《五經》尚未出版。一位在1862至1863年間住在南京的文人陳慶甲寫有記見聞的《金陵紀事詩》，其詩注云：「凡查有讀聖賢書者，父師並斬。」<sup>16</sup>1864年南京失陷，幼天王走至江西被俘後供詞說：「老子總不准宮內人看古書，且叫古書為妖書。」又說：「前幾年老子寫票要古書，干王乃在杭州獻有古書萬餘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看畢總用火焚。」<sup>17</sup>可見太平天國自甲寅四年成立刪書衙直至甲子十四年（1864）覆亡的十年間，始終未出版刪改後的《四書》、《五經》，因而所謂刪改後准讀，也並未成為事實。

13 據倫敦英國圖書館藏《武略》原刻本。

14 《金陵省難紀略》，見《太平天國》，第四冊，頁719。

15 《欽定士階條例》，見《太平天國》，第二冊，頁561。

16 見《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六冊，頁401。

17 據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一編著錄台灣故宮博物館藏件。

上引張汝南等對太平天國改書情況的報導言之鑿鑿，不可能是嚮壁虛構，他們所見聞的應是刪書過程中出現的某些稿本而不是定稿印本。根據他們所說，刪改並不複雜；十年未能定稿出版的根本原因在於洪秀全接受天父指示是勉強的，楊秀清死後這件事自然更加拖延下來。後期參加太平天國的洪仁玕在一些文告中曾追述天父關於孔孟之書不必廢的指示，他本人著作中有不少稱引和發揮孔孟儒學的話；可以看出，洪仁玕對古人古書的態度略同於楊秀清。但他沒有左右洪秀全的力量，不能促使刪書工作早日完成。

《新舊約聖經》的命運跟《四書》、《五經》不同。天父雖曾下令中止出版《聖經》，並且貫徹執行，但在楊秀清死後，太平天國卻又恢復了出版。英國傳教士楊篤信(Griffith John)於1861年2月寫了一本紀太平天國之行的小冊子，其中有這樣的記載：「他們已印出全部《新約》，《舊約》已印至《士師記》(Judges)。」<sup>18</sup>同情太平天國的英國下院議員塞克斯(W.H. Sykes)1863年2月說：「我本人就有他們刊印的二十七卷本《新約》和從《創世紀》到《約書亞書》的全套《聖經》。」<sup>19</sup>他們的話有實物可證，今倫敦英國圖書館東方書籍和寫本部就收藏有如塞克斯所說的那一套太平天國刊印的《聖經》。這些《聖經》都是太平天國後期刻印的，書名加有「欽定」二字，有別於早期刻印本。這些太平天國《聖經》都印行於1860年以後，但恢復出版的日期應更早一些。1860年8月洪仁玕回答英國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問題時說：「全部《聖經》都已刊印。」<sup>20</sup>則恢復刊行必在1860年以前。1857年10月有一位叫R.S. McLay的，從福州寫信給《香港紀事報》(Hong Kong Register)說他獲知當時在閩西活動的太平軍閱讀、印刷和散發《聖經》<sup>21</sup>。據此可知，中止出版《聖經》的禁令，在楊秀清死後不久就解除了。

在對待古人古書和《新舊約聖經》的態度上，太平天國的高層領導人為什麼有這樣的分歧？

太平天國宗教與西方的基督教是有很多不同的，雖然他們宗教的源頭來自基督教，同樣信仰上帝、耶穌，一切以天父天兄為號召。洪秀全、楊秀清的文化背景和思想雖有差異，但以天父天兄為號召以推翻滿族統治這一點無疑是一致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太平天國出版《新舊約聖經》——以為《舊約》是天父「當前下凡顯蹟設誠所遺傳之書」、《新約》是天兄「下凡顯神蹟捐命贖罪及行為所遺傳之書」<sup>22</sup>，並以《新舊約聖經》與太平天國自己編寫的書籍並列為

18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 272.

19 見《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一輯，頁49。

20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 243.

21 *Ibid.*, p. 203.

22 《太平天日》，見《太平天國》，第二冊，頁636。

人民必讀之書時，作為天父代言人的楊秀清為甚麼出而反對？這是相當令人費解的。

楊秀清假天父下凡命令中止《新舊約聖經》出版的記錄說：「天父因凡間子女，或有輕視聖旨，泥執約書，故特詔約書有訛當改。」<sup>23</sup>從語意上看，楊秀清是擔心人民根據《新舊約》而輕視他代表天父所作指示。看來，這是誰——《新舊約》還是楊秀清代天父所作的指示——是最高權威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只有在《新舊約》所說和楊秀清代天父所說不一致的時候才會出現。楊秀清是以天父附體的方式代表天父對太平天國的各種事務如作戰中的問題、官員將領的獎懲等等下達指示、發佈聖旨的，它們的內容與《新舊約聖經》中所記的各種外國故事並無關聯，談不上兩者之間會有什麼衝突。因此，我以為問題可能在於楊秀清代天父說話這種方式——楊秀清認為《新舊約》危及了他代天父說話的地位。

跟太平天國有過多次接觸並且同情太平天國的英國領事密迪樂(T.T. Meadows)，曾為「天父下凡」這類遭到當時西方傳教士指斥的行為尋找解釋，說《新舊約聖經》中有不少關於上帝同人談話的記載，上帝的靈有時會注入人體，使人在聖靈激動下說話。密迪樂說，《聖經》雖有這些記載，但《聖經》也已明確宣布，所有這些現象都已不會再有了；但太平天國的《聖經》譯本不完備，所以他們不懂得上帝已不可能通過人的嘴巴與人說話<sup>24</sup>。密迪樂的解釋是不符合實際的——太平天國宗教中的許多特異觀念和做法，主要不是由於對基督教的經典有所誤解，而是他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創造，其淵源和土壤就是中國舊有的民間迷信。但密迪樂的解釋中提及《聖經》已宣布上帝不再通過人的嘴巴跟人說話，啟發我們推想楊秀清可能發現了這一點已危及他作為上帝代言人的地位，因而下令停止出版《聖經》。

《新舊約聖經》中關於上帝或耶穌基督不再出現與人談話的內容，有下列三項：

(一)《舊約·申命記》三十四：十，「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華面對面認識的。」

(二)《新約·馬太福音》二十八：十八—二十，「耶穌走過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我就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末日。」所謂「同在」，也就是說不再顯現。

(三)《新約·馬可福音》最後說，「主耶穌被接到天上」，即到末日審判才會再降臨<sup>25</sup>。

當然，以上這些語句之宣示上帝不會再與人說話，並不是一目了然的；楊秀清是否會從中意識到問題？仍可存疑。

楊秀清在下令中止出版《聖經》前八、九天，同英國第二次訪問南京的官員利文·鮑令等人有過文書往來。他答覆了英國人所提的問題，又根據自己的觀念，向英國人提了五十個奇

23 見《天父天兄聖旨》，頁110。

24 T.T.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1856, p. 436。

25 《聖經》中有哪些宣示上帝不再出現與人談話的內容，我曾向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請教，此據該所基督教研究室唐逸先生的答覆，謹向唐先生致謝。



特的宗教—政治性問題,其中宣揚了楊秀清作為「聖神風」(即聖靈的譯名)和天父代言人的地位,稱「本軍師為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至天父下凡教導萬民聖旨則降托本軍師口出」;詢問英國人「爾等夷弟居住海外,未知同此遵天父天兄命令否?」「今上帝現差聖神風臨世,就是東王,爾等知否?」英國人大量引用《新舊約聖經》,主要是《新約》作答;其中有些回答實際上是對楊秀清的反駁。他們引用《約翰福音》、《使徒行傳》等抗辯說,聖靈的確已經降臨世間,但聖靈是和上帝一體的;東王只是凡人,不可能是聖靈<sup>26</sup>。這些往來文件顯示了太平天國宗教和西方的差異,而對方的武器就是《新舊約聖經》。楊秀清收到英國人的答覆後有何反應,未見記載。從時間先後來看,英國人答覆後八天就發生了楊秀清認為《新舊約》「多有記訛」,下令中止出版。這兩件事是否有因果關係,值得重視。

洪秀全少讀經史,有較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而排斥一切古人古書,這也頗費推究。如上所述,洪秀全在創教之初以至起義以後兩年,雖然獨尊上帝,但仍予孔孟等古人以一定的地位;其上帝實是中西合璧的上帝,其教義也有中國經籍的影響<sup>27</sup>。這種情況是同創教者洪秀全、馮雲山出身於農村知識分子的文化背景相應的,是合乎常理的。但在建都南京以後洪秀全却改變政策,變成厲行排除孔孟及一切古人古書。這不能用「反封建鬥爭深化」來解釋;這也不是洪秀全的思想有了飛躍——曩以孔孟為是今以孔孟為非。洪秀全本人思想受孔孟和傳統儒學的影響是依然如故的。如太平天國後期出版的書引用洪秀全的話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總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他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看來並無新意:「生殺由天子」、「君明臣自良」、「夫道本於剛」、「妻道在三從」等等<sup>28</sup>。可以說,洪秀全主要是在形式上、態度上(而不是在內容上)要徹底排除孔孟和古人古書。

洪秀全這種態度可能與他個人的特殊心理經驗有關。他早年有病中升天受命的幻覺,他把幻覺中所見與《勸世良言》互相比附,因而確信這種幻覺是真實的經驗。其內容最初比較樸素簡單,後來隨着「拜上帝會」準備造反而逐漸誇大,形成了洪秀全是上帝之子、天上有父母兄嫂一起支持他的事業的故事。這樣的誇大、附會是他有意而為的,但此後由於造反順利,自己受到強烈的「自暗示」,日益信以為真,以為自己確是上帝派遣下凡的兒子。洪秀全早年還受到多次應考不第的強烈刺激,這種被壓抑的欲望在潛意識中可以造成反常的心理,或表現為一起事就急於開科取士,或表現為目空一切,摧折原先所嚮往的事物,以求心理滿足。洪秀全這兩種意識逐漸蘊積,促使他在建都南京後,發起一個運動,造成在獨尊上帝的旗幟下前無古人的局面:上帝的真傳已迷失數千年,現在只有他獨得,一切要由他來從頭開闢。當時有人說他「自聖公然蔑古聖」,唯其因為「自聖」,所以就要排斥一切「古聖」。

26 黃光域等譯《麥華陀等1854年6月訪問天京文件輯錄》,見《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一輯,頁8-24。

27 參看拙著《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頁275-337。

28 《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幼學詩》,見《太平天國》,第二冊、第一冊。

楊秀清跟洪秀全正相反。他識字不多，但耳濡目染，頗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尤其熟知民間故事中的英雄人物。這些在民間流傳的英雄事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對人的善惡是非觀念和行為準則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楊秀清周圍還有一批司筆墨的知識分子，如盧賢拔、曾水源等早年參加起義的農村塾師以及傅善祥等後來者。這些人和楊秀清朝夕過從，必然互有影響。這些人的文化背景與洪秀全相同，但沒有洪秀全那種獨特的心理狀態。他們比較易於接受的正是獨尊上帝而又不摒棄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教義。楊秀清堅持不否定古人古書的作用，可以說正反映了他們的願望。

在洪秀全、楊秀清的意見分歧中，楊秀清以天父代言人的至高無上身分獲勝；但兩三、年後楊秀清即被殺，所以洪秀全仍是最後的勝利者。但洪秀全的勝利却促使太平天國走向失敗。原因就是太平天國由此而難以吸引和充分利用知識分子。

太平天國對知識分子也不是不予重視的。立國之始就開科取士，其後制度日備，有會試、鄉試、縣試各等，而且錄取頗寬，這顯然有吸引知識分子的用意。時人記述分析說：「在湖北鄉試，入場未及千人，取中者至八百餘名，固由考官無學，氣類相聚，亦洪逆寬其資格，誘以仕途，且示士心悅服，進取者衆也。」<sup>29</sup>但太平天國開科考試雖然文仍用八股體，詩仍用試帖體，但題目不准用舊時的《四書》、《五經》，而完全出自太平天國的教義，如甲寅四年湖北鄉試文首題：「真神獨一皇上帝」，次題「皇上帝乃真皇帝」；詩題：「天父下凡事因誰，耶穌捨命代何為」。庚申十年（1860）「天試」文題：「坦盤惑鬼語，洪水浸天下，上帝永約云，彎彎日教化。」<sup>30</sup>這些題目是只熟悉孔孟儒學的讀書人所難以理解甚或望而却步的。由於這方面的原因，加上對異端的成見，應試的雖也不乏士子，但多數是粗知文義的醫卜星相之流。

歷史資料中還多有太平天國將領和下層官兵尊重讀書人的生動記載。一位後來以環遊世界聞名的南京人李圭，庚申十年被俘在太平軍中兩年多，初任雜役，被發現是讀書人後，即提拔做「先生」，受到熱烈的優待，解衣推食，甚至要為他說媒提親<sup>31</sup>。另一名叫顧深的秀才，在表明自己是塾師後，被派充「先生」，為館主看信寫信，說《西遊記》、《封神演義》故事，備受歡迎<sup>32</sup>。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被其下屬稱為有三樣好處：第一愛讀書人，第二愛百姓，第三不好女色<sup>33</sup>。陳玉成愛讀書人，也就是優待他們，用作「先生」。所謂「先生」，就是司筆墨，任抄寫書記工作。太平天國將士珍視讀書人，是中國農民對讀書識字者的一般心理；感情固然真切，

29 《賊情彙纂》，卷三，見《太平天國》，第三冊，頁112。

30 《賊情彙纂》，卷三，見《太平天國》，第三冊，頁112；姚濟《小滄桑記》，見同書，第六冊，頁462。

31 李圭《思痛記》，見《太平天國》，第四冊。

32 顧深《虎穴生還記》，見《太平天國》，第六冊。

33 刀口餘生《被擄紀略》，見《太平天國資料》，頁206。

但只是用作「先生」，並不是用為謀主，作政治軍事的顧問。對於應考得中的知識分子，太平天國也大都用為師帥、軍帥等基層鄉官，位等高的，也只或用為考官，或任命為高級官員司筆墨，即用為高級「先生」，從未委以大任。這就是太平天國既重視又不重視知識分子的政策。

太平天國初起時有過錢江前往投效的傳說。錢江在鴉片戰爭中力主抗英，是有識見有才能的「狂士」。傳說他上書洪秀全，獻《興王策》，其事雖未能證實，但這一傳說是與當時洪秀全不排斥孔孟和古人古書的背景相應的。我在英國圖書館寫本部獲見殘文一頁，其中建議貴民求賢，效法漢高、明祖，勿眷戀武昌云云，與傳說之錢江《上天王書》同。可見即使不是錢江，也確有策士向洪秀全上書圖謀大事。但這樣的事、這樣的傳說，在洪秀全厲行排斥孔孟和古人古書後就難以再有了，因為讀書人除了視太平天國為叛逆外，還多了一層思想文化上的隔閡。即使仍有人願靠攏太平天國，也會給洪秀全的奇特思想嚇退，並且不大可能得到重用。有這樣一個故事：「癸丑七月，安徽望江縣僞軍帥稟奏保薦望江縣生員龍鳳臚有安邦定國之才，龍鳳臚偕其父至江甯上書洪逆，不下數萬言，內引周武、漢高為比，狂悖已極。洪逆批數字曰：『周武、劉邦是朕前部先鋒，卿知否？』龍鳳臚不解所謂。旋送入詔書衙學習，並未擢授僞職。」<sup>34</sup> 洪秀全既排斥古人，自以為聖，所以他的周圍不可能有起參謀顧問作用的讀書人。

太平天國後期的支柱忠王李秀成被俘後，在親筆供詞中指出了太平天國的十條失誤，其中第九條稱：「誤國不用賢才」。此外，問官還筆錄了他對曾國藩所提若干問題的回答。曾國藩問：「官兵某事好？某事不好？賊中某事好？某事辦得不好？」李秀成答：「官兵多用讀書人，賊中無讀書人。」<sup>35</sup> 這可以說是李秀成對太平天國失敗原因的一個補充看法。

洪秀全的意識形態政策是完全失敗的。一方面，他堅持排斥孔孟和古人古書，因而沒有可能吸引較多的知識分子為自己所用；另一方面，他雖然力主以《新舊約聖經》為太平天國的必讀書，却也沒有贏得西方傳教士的好感。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西方國家以大炮轟開中國大門，不少人接受了鴉片，但拒絕與之俱來的基督教。這時洪秀全崛起，以上帝為號召，並且刻印《新舊約聖經》，曾使西方國家特別是他們的傳教士喜出望外。但從後來許多直接和間接的接觸中，他們逐步認識到太平天國的宗教與他們的差異。他們起初特別不滿於楊秀清自稱「聖神風」即聖靈，不滿於「天父下凡」的做法，以楊秀清為太平天國基督教中的異端因素；後來則發現洪秀全稱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穌之胞弟，與西方基督教「三位一體」的教義大相逕庭。洪秀全雖然堅持出版《新舊約聖經》並曾宣布它們的神聖性，但事實上，他以自己的思想和需要批注《聖經》，甚或修改《聖經》的內容。這些批注、改動以及他寫給中西臣民的許多詔旨，處處顯示他的怪誕想法，不但為西方教士所不能接受，而且也為大將如李秀成所不能理解。當然，西方傳教士後來疏遠、反對太平天國，首先是政治原因——英國確立了干涉政策，但洪秀全的宗教思想與他們越來越不合拍，也是一個客觀上的因素。

34 《賊情彙纂》，卷十二，見《太平天國》，第三冊，頁328。

35 見羅爾綱《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362、364。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Policy of the T'ai P'ing Heavenly Kingdom

(A Summary)

Wang Qing-cheng



The attitude of the T'ai P'ing Heavenly Kingdom leaders towards the doctrine of Confucius and the Christian Scriptures changed over the years. There also existed divergence of views among the leaders. Before the Kingdom made Nan Ching its capital in 1853, its leaders, including Hung Hsiu Ch'üen 洪秀全, took a mild policy towards Confucianism, tolerating its existence. After the summer or autumn of 1853 Hung launched a campaign aimed at the ousting of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works by other ancient authors by the prohibition and burning of books. Only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and books produced by the T'ai P'ings themselves were allowed to be published and circulated. Yang Hsiu Ch'ing 楊秀清 disagreed with Hung. In the spring of 1854, Yang through the words of the Heavenly Father spoken through him, affirmed the value of the Four Books and Thirteen Classics, opposed the destruction of ancient books. Soon he instructed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should cease. Hung had no alternative but to accept these instructions. He proclaimed that the people would be allowed to read the Confucius classics after they had been revised. This did not signal a change of mind on Hung's part, and to the end of the Kingdom his attitude towards Confucianism and ancient works remained as it was. This made the Kingdom less attractive for intellectuals, and this wa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its failure. After Yang's dea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ible was resumed. However, Hung amended the Bible according to his own extraordinary way of thinking. As a result, he was unable to win the approval of Western missionaries.